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动乱年代】	暴雨欲来风满楼（上）	丁广举
【亡灵祭坛】	北大，你有一段未曾面对的历史	王友琴
【往事非烟】	1970年“一打三反”时，我在科大校学习班	许子明
【童年旧事】	记得当时年纪小——1966—1968记事	郭爱平
【史海钩沉】	自贡文革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王 锐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动乱年代】

暴雨欲来风满楼（上）
——“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北大“社教运动”

·丁广举·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浩劫，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民族痛史和灾难。有着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成为文革的策源地，也使北大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必须否定文革，批判文革，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文革制造了千百万亡魂，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那场浩劫在全国是怎么搞起来的？北京大学又是怎么卷入的？谁之罪？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我于1960年8月（我在阜阳一中读高二放暑假期间）在安徽老家（涡阳县）应征入伍，到海军旅顺基地当了一名海军战士；1964年根据当时高教部和国防部的联合通知精神，经所在部队推荐，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后不久改称“国际政治系”）录取，成为一名“调干大学生”。入学后不久，就赶上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或“社教运动”）。我曾以党员学生干部的名分参加过“社教”工作队在燕南园召开的座谈会，主持人是康生夫人曹轶欧等。因刚入学不久，什么都不了解，没有发言。

本文主要阐述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北大的“社教运动”，及北大是怎样紧跟中央部署，一步一步陷入“文革”泥潭的。

一、风雨欲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与全国“社教运动”

要了解文革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应从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说起。

众所周知：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和“一平二调”、“共产风”等，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以致数千万人（主要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为克服“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于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形势开始有了些好转。特别是1962年1—2月近一个月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后，可以说我国已基本渡过了国民经济的最困难时期，但还没有全面好转，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关于困难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大实话激怒了毛泽东。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党史研究》1985年第6期）半年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对他所谓的“修正主义”进行反击。

1962年8月，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8月6日，毛泽东就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理应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24日，毛泽东又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并多次在一些同志讲话时作了插话，都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将会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些论断后来被党中央推崇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党的“八大”（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关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判断，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扩大为所有方面和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党越来越深地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深渊。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开始大抓阶级斗争。1962年冬到1963年春，许多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陆续开展了“社教运动”，亦称“四清运动”（2010年8月出版的《辞海》第六版对其解释为：“1963年到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实际上，时间应从1963年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有关材料的批语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根据毛泽东上述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会议讨论和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称“前十条”）。该决定列举了社会上九个方面阶级斗争的表现（我还记得：这一错误论断，还成为1964年全国统一高考文科政治试题的重要考题），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

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断言“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落在了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因此，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杭州会议后，各地按照中央指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进行试点，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196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各地“社教”试点中提出的问题，讨论了农村工作和“社教运动”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干部的基础；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分情况，分别对待；要求运动和生产相结合，要始终抓生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等。这些规定，在当时起了一些好作用，但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十条”一样，对阶级斗争形势都作了错误的夸大的估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4年3月初，中共中央发出《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这样，“社教运动”即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1964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再次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反修防修和“社教运动”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认为“城市和农村大约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修正草案（即“后十条”），对形势再次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提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进行和平演变”。这样，又大大改变了原来运动中要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要求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10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斗争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扩大“社教”工作团的权限，“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夺权斗争”正式展开。中央关于有三分之一政权已经“烂掉了”的估计及开展夺权斗争的指示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1964年12月2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社教运动”中的有关问题。1964年年底之前，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农村的主要矛盾，制定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初，毛泽东批评了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问题。此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会议又重新讨论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进行了重要修改，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存在的所谓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规定，如强调运动“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要搞神秘化，要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干部，他们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等重大问题。但是，“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其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新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刘少奇不同意“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毛、刘两位主席在全会上发生尖锐的争论，这成为在一年多以后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的一个所谓重要罪过。

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开展“社教运动”的企业单位有1800多个，占总数的3·9%；到1966年春，全国约有1/3的县和公社进行了“四清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第578页）。全国成为阶级斗争的大战场，形势正在走向更大的政治风暴。

1964年2月7日北大校刊报道：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2月，全校有2100多名师生分批到京郊平谷和通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同年6月15日，又有400余名师生到平谷县峪口、马坊等公社参加农村“社教运动”。10月又派往北京市朝阳区764人；去湖北荆州专区江陵县843人（戈华副校长带队）。

1965年11月17日，北大校党委召开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布置工作时提到现有6359名师生在外参加“四清”（将近全校师生员工50%的人在校外投入了“四清”运动）。其中有1511人在四川省的眉山县和彭山县（史梦兰带队）期间，在眉山县发生了物理系62级女生汪静瑜遇害身亡的恶性事件，至今没有结论。从此可以看出：北大党委在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中对“教育革命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青年大学生们正在被训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二、黑云压城——从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到《五·一六通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著名明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认定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该剧本是吴晗为响应毛泽东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鼓舞下创作的，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姚文元却把剧中所写的有关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情节，硬与1962年以来受到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实际上，这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真实的目的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当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这种作法是毛泽东当时同意的），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姚文发表后，因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未研究和讨论过姚的文章，北京的各大报刊未立即予以转载。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指示上海立即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因不明真相，也没立即订购。直至11月底，《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转载姚的文章，并把其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这些，更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北京市委和刘、邓等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是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谈话中，把这一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他说：《海瑞罢官》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到1966年初，全国以致各地方报刊充斥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显然，毛泽东是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作政治批判，已下决心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政治运动。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7月成立，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扩大会议。会议针对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出现的上纲上线、人身攻击等不正常现象，为了对已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约束，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该提纲明确认为：吴晗的问题只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学术讨论要以理

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该提纲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未表示反对），于2月12日发至全国。

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中宣部没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3月底，毛泽东又在杭州先后3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指出：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毛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一派封建帝王高高在上、无法无天的做派。

4月10日，由江青主持整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至全党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称“整个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次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江青、姚文元等制造的又一场严重的文字冤狱。1961年3月，邓拓应邀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的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到1962年9月止，共发表150余篇。另外，从1961年10月起，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以“吴南星”为笔名，轮流撰稿，先后发表了50余篇杂文。这些文章多数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也有就各种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或褒或贬，旁征博引，议论横生；还有知识小品、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等。也有些是针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作风，如浮夸风、共产风、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等的讽刺和批判。譬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伟大的空话》以及《专治“健忘症”》等。总之，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受到读者欢迎。《燕山夜话》还曾出版了合集。

但在《海瑞罢官》被作为政治问题批判后，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彭真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邓拓亦曾化名向阳生写文章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向“道德继承论问题”的学术研究方向。这些，被张春桥、江青等人利用，向毛泽东告了状，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决心“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中宣部。1966年3月20日—28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找康生谈话，再次明确指出：《二月提纲》是不分是非的，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也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这些意愿）4月1日，张春桥便将他们炮制好了的《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意见》端了出来。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戚本禹、关锋等人批判所谓“要害”的文章。4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彭真在会上遭到批判。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时至此时，北京市委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北京日报》于4月6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进行了一些批判。但由于仍把这种批判限制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内，因而没有使江青一伙感到丝毫的满意。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一报一刊,说它们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避重就轻,大事化小,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副标题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一反对《燕山夜话》的羡慕之情(《燕山夜话》出版后,姚文元曾一度很羡慕,并致函北京出版社负责人,称赞它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说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元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起而效尤,纷纷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高潮。很多地方也抓出一些当地的“三家村”、“四家店”,从而使不少人遭到迫害。4月上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停止工作。随之,北京市委也陷入瘫痪,邓拓以死抗争,于《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即1966年的5月17日夜间,自杀身亡。

在4、5月份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邓拓时,惊动了在北大社教中挨整的“社教积极分子”。因为邓拓曾是1965年7月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副组长,主持了“整风会议”。整了那些给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哲学系的左派,他们觉得平反、翻身的机会来了。

可以说,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进入1966年后,更是寒风阵阵,狂风暴雨即将降临整个中华大地。经毛泽东提议,1966年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虽未出席,但会议完全是按照他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部署和安排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次会议开得相当奇特:会议的第一项就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但实际上并不“座谈”,而主要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在会上讲了约8个小时,传达了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等内容。最后,康生把毛泽东这几次谈话概括为两条:一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开展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6年,矛头主要也是对着彭真和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进行认真讨论,就顺利通过了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由康生、陈伯达等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重要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时,只有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该《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列举其十大罪状,进行种种歪曲和指责。说它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

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该《通知》明确提出：在党、政、军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该《通知》还认为：要达到以上目的，“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这些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尖锐的话语，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为这场行将到来的“文革”风暴定下了基调，明确了斗争纲领。

会议还生拉硬扯地错误地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的“反党错误”，将他们撤职查办。这就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事件。

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文化革命5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将其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陈伯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不久，即8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等（原还有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成员谢镗忠、尹达、穆欣，顾问陶铸等。不久，这些人因与江青、康生等观点不同，而被排挤出去，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这个小组逐渐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只受毛泽东一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部。这就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引证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历史，大力宣扬“政变经”，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林彪在讲话中，还别有用心地狂热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天才”，鼓吹“个人迷信”。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的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文化大革命制定了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重新确立了领导“文革”的组织机构；标志着“左倾”错误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以说：由于《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达，使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这是文革的起点。

5月19日晚，北大校党委开会传达中央中央文件，校党委委员先一步听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聂元梓作为党委委员参加了会议、听了传达。《五·一六通知》如同晴天霹雳，把许多初闻者都震懵了。会后，聂元梓向哲学系“左派”传达了中央《通知》的内容。此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7名作者相互串连，在《通知》的鼓舞下打算给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北大问题；后经集体讨论，决定改为写大字报。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亡灵祭坛】

北大，你有一段未曾面对的历史

• 王友琴 •

迟疑很久，我才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被一个问题萦绕：我为学校做了什么？

1981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未名湖，你听我说》的短文，写到了湖畔风光和刚刚过去的文革祸难，也写了自己得到某种选择的自由时产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这篇文章曾做成配乐朗诵在电台广播，也被选入现代散文选集。我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诚挚坦率的言辞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这次前辈校友邀请撰写未名湖，我担心会重复旧话而不能动笔，直到我写完了《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也收集当时的文字资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所记659名受难者出自全国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这一篇集中于北大一个学校。

我未曾亲眼看见过北大文革。然而我在文革后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难者死亡的地点——大多数受难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园中的，也就是说，屠戮场所，就在未名湖周围。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打出一个一个方块字的时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点会具体形象地浮现在眼前。

1968年，俄语系讲师龚维泰被关在第一教室楼。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们的人睡在床上。11月7日，他在系中遭到“斗争”，除了“坐喷气式飞机”即弯腰低头双臂被反拧在后形如飞机之外，拧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间，龚维泰用刮脸刀割动脉自杀。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为什么不起床，掀开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系中一名女同事那天从门外经过，看到地面湿湿的，刚刚用拖把擦过，后来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龚维泰的血。

我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常常在简称“一教”的这个楼里上课。坐在靠窗的座位时，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欢快地盘旋，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题为“啁啾”。但是我丝毫不知道脚下的地板上，曾经流淌过人血。看不到有关文字记载。文革刚刚过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经是水洗般的遗忘。

进北大西门往北，在校园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幽静的小湖。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个，却没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处“海淀”（此“海”并非今日所说的“大海”之海），北大校园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根横枝伸向湖面。

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当红卫兵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兴高采烈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的时候，杨明爱在那根横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树以及那横枝至今依然还在，杨明爱的名字则没有人知道了。

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7岁，家住北大旁边的蓝旗营109号。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他们用铜头皮带、木棒和铁条毒打陈彦荣刘万才夫妇。下半夜一点，陈彦荣被打死，刘万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



文革后“平反”，标准做法是付给家人240元。陈彦荣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给了他2500元。他的妻子拿到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呐。”

人在哪里？他们原本是在未名湖边走着、跑着、工作着的活生生的人。在湖边，他们遭到了“斗争”，毒打，监禁，各种侮辱，还有心理摧残和折磨。63个人被害死了，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如今未名湖水依旧，但是永远不会再现曾经投影其中的受难者的身影。

1998年为百年校庆编写了两卷本北大历史。我注意到，书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连副教授都不记，更不要说年轻教员和普通职员、炊事员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学生在内的30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不过，清华大学篇幅更长的校史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我为此问起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苦笑着说，就这样，还有人到办公室来纠缠，要把现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删除。

对比于这种嚣张，是受害者们的沉默。

1999年，一位同届北大同学告诉我，历史系俞伟超老师在大教室讲授“秦汉考古”，听课的学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听说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需要一本文革“词典”来解释这种词语，不过本书读者多半还都知其意）后自杀未死留下的残疾。他那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往博物馆给他写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从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邮局退回的信。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有五个人“自杀”身亡。我用了引号，因为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自杀”，而是被文革谋杀的。俞伟超老师在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遭到“斗争”，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卧轨，火车头把他铲出了轨道。他活了下来，文革后成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

我当然不会给他讲历史写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说如果北大历史系的文革历史都不写出，遑论别处。他的失去的手指显然也每一天都提醒着他的文革经历。但是，连他也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什么？我确实很想向他询问，而不是自己来猜测。可是我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经在2004年离世。

北大之湖，名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从未命名，但是这“未名”就成为湖的名字。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别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对的近期历史，却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不能总是未被面对下去。

一本世界历史书谈到亚洲文明古国时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这种说法大概过于简略。不过，中国古代文明确实留下了很多历史书。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了记录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写作也承担了其他文明中可能并非由其承担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阐明道德原则和是非基准。

正因为此，历史写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文革历史的写作，对当代人尤其可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为了面对历史、记录真相，也是为了社会的道德自救。

1990年代，在北大西门内，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远古时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后，在柔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可是我也知道，1968年5月16日，就在这块宅基地上，在互为直角的“民主楼”和“外文楼”对面，又加筑了两面围墙，围成了“监改大院”，关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

因为被关者不认为是人，这种校园监狱被俗称为“牛棚”，全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个月，里面有监规，还有各种刑罚。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普通话说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没有能背诵出毛泽东语录，被罚跪的时候，头上还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来就遭打。

西语史另一教授朱光潜，有一天正在“劳改”，一个看守人员叫他过去，扔给他一条绳子，说：“老家伙你活得腻不腻？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文革中西语系也有五个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

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

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 来源：《摄影与诗歌》网站

~~~~~

【往事非烟】

1970年“一打三反”时，我在科大校学习班

• 许子明 •

◇ 进学习班当晚就被李大队长呵斥

1969年12月我们六系师生疏散到广西柳州、桂林等地。1970年科大已经搬迁到合肥。当地工军宣传队进校，开始了“一打三反”，全校师生员工被分配到淮南、马鞍山各地办学习班，校学习班在安徽工学院办。我因为是“校革委会委员”，让我参加校学习班。我四月底回到合肥。这时“校学习班”已经开始。我被分在三班。当天是星期天休息，有家的都回合肥师范学院了。记得我的宿舍里只有黄英达坐在桌子边写信。我躺在二层床上，无聊中我拿出笛子在吹。这时突然间门“铛”的一声被踢开，一个黑黑脸的家伙，背着手气势汹汹的进来。这时黄英达立马站起来，点头打招呼。我根本不认识他，没理他，照旧吹笛子。见我没理他，他气得在屋里转了一圈，“你！”突然一声大吼，他用手指点着我：“你叫什么名字？”“许子明”我答道。“别吹啦！”他命令我，“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反驳他，“你、你……”他被我的顶撞气坏了，两眼露出怒火，气得嘴一张一合，嘴角露出的银牙闪着阴森的寒光，“你、你没看到人家（黄英达）在写材料吗！”他在找借口（黄

明明在写信！）。“好，不吹了。”我也屈服了。这时他背着手气哼哼地转身出去了。黄英达小声告诉我，这是“李东林大队长。”——这时我才体会到“一打三反”的恐怖气氛。

◇ 李大队长导演“批斗会”尴尬收场

第二天，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王师傅找我谈话，告诉我“老许，你是依靠对象，要主动地参加批判。”我没想到，我竟然是“依靠对象”！——那我也高兴不起来。上午，说要批判方树尧（六系58级）。李东林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咬着牙，巡视着每个人，坐在边上督阵。王师傅先问：“方树尧，你那天排队吃饭，和沈莲官（65级学生）说了什么？”方树尧如实说了过程。“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有几个学员也装模作样“批评”了几句。完后就是冷场。没有人说话。“滚出去！”突然一声大吼，坐在旁边的李大队长一下子跳了起来，指着方树尧喊：“你，滚出去！”方树尧脸也吓白了，溜溜地出去。这时李大队长指着我们班上的学员，“你，你，还有你！这是批判吗？要站起来，冲到他对面，点着他鼻子才行！”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北京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才知道安徽原来比北京还牛！“重新来！让他（方树尧）进来，重新批斗！”方树尧是我们的同事、“战友”，他是58级，是我们学长，没怨没仇如何恨起来？在这为难之时突然“哇”一声，孙贞寿（65级）大哭起来“我做不到！”这场李大队长导演的批斗会就这样尴尬收场。

◇ 李恒昌进学习班当晚悬梁自尽

校学习班地点是安徽工学院。参加校学习班的人是文革的两派头头和“有问题的”干部和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所以被定为“依靠对象”。李恒昌（原校保卫处干部）当时是校“文攻武卫”的大队长，当时很红。可不知谁举报他“反林副主席”，说林彪后脑勺的包是“反骨”。就这一句话立马撤了“文攻武卫”队长，送到“学习班”。这从天上突然跌到地狱的打击让这个东北汉子绝望到底，当天半夜在学习班教室的门框子上悬梁自尽。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太大了！一大早在厕所（那个厕所没有隔断）解手时，战纪科（原校政治干部）就议论道：“看来压力太大了！”大家也感到这“一打三反”的搞法有点“过分”。也不知谁马上报告了工宣队。李大队长立即要学习班全体紧急集合。当大家刚刚坐定，李东林背着手，用凶狠的目光来回扫着大家，会场静悄悄，每个人不敢出气，不知道李东林又要发什么飙。就在这时他目光落在后排的战纪科身上，“战纪科！站起来！”这突来一声大吼给大家下了一跳，只见战纪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战纪科，你今天早上在厕所说什么啦？”战纪科想了想，小声说：“我说他（李恒昌）可能压力太大了。”“胡说！”李东林立刻打断战纪科的话，接着说：“他反林副主席，是反革命！他自杀就是对抗‘一打三反’，他死了活该！他是死有余辜！”

当时学习班“后勤组”的刘家华后来告诉我，吊在门上的李恒昌是司有和抱下来的。在等待法医来之前，李东林让刘家华一个人在那看着。她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过死人，看到躺在地上的李恒昌瞪着眼，脖子右边一道被绳子勒的紫色痕迹，吓得全身发抖。

刘家华后来又被李东林安排将李恒昌爱人和二个可怜的孩子遣返回东北原籍。（后来落实政策是都回来了）

◇ 阎宝根跳楼，工宣队见死不救

我进班一个多月，就迁到合肥师范学院的教学大楼四层。阎宝根是二系学生。他进学习班的罪名就是“反搬迁”。据说，有次李东林去他们宿舍，他站在床上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大喊：“欢迎李大队长！”李东林不是傻子，“好小子，给我鼓倒掌，这不是明明是在挖苦

我吗？”气得他把阎宝根也揪进了学习班。还派专门人看管。同时，又挖出他“反毛主席的言论”。有人举报，他说过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依山傍水，风水好”，其意思不就是说，

“毛主席所以当了国家领导人是靠‘风水’了吗？”这么大的罪名让阎宝根对前途失去了希望。面临分配他说，大不了带着我女朋友（同学）回家种地。就是这个愿望工宣队也不让他实现。工宣队又使出了文革中惯用的手法：找他女朋友谈话，对她施压让她分手。这招让阎宝根彻底地失去了希望。于是一天中午午觉时趁看守人不注意，他突然翻窗从四楼跳下。

“跳楼啦！”正午睡中，突然有人在走廊里喊。我们爬起来跑到窗边往下看，静悄悄地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我又回到床上，刚躺下，就听到窗外喊“哎呀，我的妈呀！救救我吧！”这时，我又回到窗前往楼下一看，原来他跳下时正好先落在窗下一辆旧轿车上，又弹到地上，开始他晕过去，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只见他从地底上坐起来，用手一摸脸，那血把他本来发白的脸一下子抹成了红脸。看到这恐怖场面，我难受得一下子差不多要呕吐出来，立刻回到床上躺下。后来有人给他送到九七医院，据说工宣队不让医生抢救，阎宝根大呼“医生老爷救救我吧！”到了下午他喊声渐弱，五点左右死去。这是我在学校学习班见到的第二个自杀情景。

◇ 女生宿舍丢表，我被强迫写证明

一天中午吃饭，沈莲官从楼梯对面女宿舍走出来和我一起下楼。她和我说：“倒霉，昨天一宿没睡好！”“什么事？”“我们宿舍刘×的手表丢了。工宣队挨个搜查，闹腾一晚上。”等吃完饭回到我们班上，当新闻我随便说了一句：“听沈莲官说女宿舍有人手表丢了。”——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原来班长曹平（马列教研室）立刻向工宣队汇报了。下午一起床，曹平通知我到学习班办公室一趟。一进门是麻子脸孔师傅。“听说沈莲官向你说了什么？”“是的。她说她没睡好，有人丢了手表。”“她为什么向你说？”“我哪知道！”“这说明她心里有鬼。”“不知道。”“那好吧，你如实写个证明材料。”“这有什么可写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举报人家吗？”我觉得这对不起沈莲官。但，看来不写不成。他把纸笔都推到我面前。我想了想提笔写：“奉工宣队之命，……”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主动写这个证明材料。没想到，这下子惹出大麻烦。写完后，那孔麻子一看到这句“奉工宣队之命”立马不高兴了，“你们大学老师文化水平高啊！什么‘奉工宣队之命’，这不是有情绪吗！”回到班里，不久工宣队的王师傅开会回来了，说，刚才石政委开会点了你，这是对“工军宣队”有抵触情绪。老许你要好好反省写个检查。无奈，我只好狠狠地批判了自己写了一个违心的检查交上去才算过关。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呢？——这简直就是“白色恐怖”，等熬到学习班结束，恨不得赶快离开学校。

◇ “一打三反”的反思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就是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科大下迁安徽合肥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把我国自主创立的好端端的理工科大学毁于一旦。

科大广大师生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对学校前途的担忧要求科大迁回北京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安徽工军宣传队借助“一打三反”对科大广大师生的残酷打压，制造“白色恐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迫害造成七名师生自杀，其罪行不亚于法西斯分子。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那些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所谓的“工宣队”头头也遭到了历史的惩罚。臭名昭著的李大队长——李东林，后来也遭到了“批斗”，记得拉到学校礼堂时，在台上低着脑袋，往日趾高气扬，“谁不斗，就斗谁”的“李大队长”也有今天。

我们在“一打三反”中，因为有人“举报”，有些师生而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迫害致死。我认为那些“举报人”很卑鄙；我也憎恨那些“工宣队”——如李东林之流，这些恶棍对我们无辜的师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那些“举报人”和“工军宣传队”又能怎能兴风作浪，耀武扬威？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庆幸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在科大建校即将六十周年之际，“痛苦”地回忆一下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让后来的科大师生知道，在科大光辉的六十年历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尽管很短，但也不要忘却。

〔作者许子明，中国科大6005班校友。〕

□ 摘自《疏散广西到“一打三反”的几段回忆》，原载《我们心中的科大》，2018年9月

~~~~~

### 【童年旧事】

记得当时年纪小——1966—1968记事

• 郭爱平 •

那年我还没满14岁，在武汉市第六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懵懵懂懂，充满了幻想，追求着那个时代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喊着一些自己不懂的口号。

我从读初中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被我坚持了许多年。那时的日记每周要交给老师过目，所以我的日记里写满了标语口号以及表决心之类的豪言壮语，现在读来非常可笑。

这是1966年初夏的日记一则：

▲ 1966年6月20日 星期一 晴

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深入下去。今天上午开会传达了团市委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百年千年的大事，直到世界上不存在阶级敌人为止。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当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还是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那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个不到14岁的初一学生写出了这样的日记，现在的中学生们也许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就是当时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国人民都疯狂地投入了革命，包括年幼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不上课了，忙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每天都有新动向，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老师们带上高帽子剃着阴阳头在台上挨斗，我们在台下高呼口号。那些满腹经纶的老师原来都是反革命？年幼的我们很不理解，却也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学校的反革命越

来越多，几乎每个老师都是反革命，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的地理老师刘耀岚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而且还是军统特务。（刘耀岚老师文革后平反并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师）

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自那以后，文革愈演愈烈。我们住的那一条街也开始不平静。珞珈山街的这一边住了很多大资本家，另一边住了很多老干部。开始是资本家的家被抄了，从他们家中被抄出来的布匹绫罗绸缎旗袍绣花鞋古玩字画菩萨雕像都堆在街上，红卫兵放一把火就在街上熊熊燃烧。

那些大资本家则被勒令在炎炎烈日下穿上大棉袄站在火堆旁边，还要不停地说：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一边强摁着他们的头，一边高呼着革命口号，口号的内容极尽人身攻击之能是：“砸烂狗头，火烧狗头，油炸狗头，千刀万剐，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等等等等，不知道是什么人才能编出这么恶毒的口号。

记得当时家里的墙上挂了一个芭蕾舞《天鹅湖》的石膏雕像，因为《天鹅湖》是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经典剧目，理所当然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取下那个雕像到街上给砸了个稀巴烂。然后觉得光砸掉一个雕像的革命行动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藏书包括那些世界名著都撕碎然后烧光。家徒四壁，空空荡荡，我们家连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更别说值钱的金银财宝，我想要革命也不知道劲该往哪里使。

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斗完了，毛主席又一声令下，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接下来就轮到那些老干部们遭殃了。我们那条街上住了不少老红军，局级以上的高干，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王盛荣也住在我们家对面，因为他只有一条腿，我们都喊他“王跛子”，他也从来不开气，总是跟我们玩。

那些深居简出的老干部被拖出来游街，红卫兵们押着他们在前面走，一条街上的孩子们都跟在后面看热闹，队伍十分浩浩荡荡。人越多，红卫兵们就越神气，当然红卫兵也换了一帮人，原来最早的红卫兵（后来叫“三字兵”）也靠边站了，现在换的一帮人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就是最早的造反派。革命口号也从“打到万恶的资本家！”“破四旧立四新！”换成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砸烂×××的狗头，再踏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当时十分庆幸自己家里既不是大资本家也不是老干部，但是我却异常纠结自己不是所谓的“红五类”。我非常羡慕那些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手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们。在我的档案里各种表格上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我总是填“职员”，我不明白这一分类的确切含义，却本能地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词。

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知道我的出身有问题。记得小学毕业时我被音乐老师推荐报考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声乐系，专业考试我连连闯关，主考老师说我是金嗓子，还有老师开玩笑说我是“小郭兰英”。但最后录取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我的录取名额被当时的武汉市副市长孙荣章的女儿孙雪涛顶替了。

有同学偷偷告诉我，之所以我没有被录取，是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从那以后，我惧怕填表，任何时候需要填表格的时候，我总是背着人偷偷摸摸把“职员”这两个字飞快地写上去，然后赶紧把表格对折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我那时做梦都希望自己出身在工人阶级，或者是贫农家庭，顶好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彻底的无产阶级，而且是祖传三代的赤贫阶层。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红卫兵组织会发展我，无论我是怎么努力靠拢组织，也没有人会要我这样不伦不类的人。文革一开始，我就从班委会被踢出来，不再是班上的中队委，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极差但成份好的学生忙着组织“红卫兵”，选代表去北京大串联，我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根本就没有我的份。所以从文革开始直到下放农村，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不是我不想，是没有人要我。

到了1966年10月初，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内部有些乱了，于是高年级的学生趁机成立一些五花八门的组织，什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兵赤卫战斗队”，“红战友”等等。当时有个高三的学生，曾经当过我们班的辅导员，他大约看我太可怜，就说他们准备自己组织出去革命串联，吸收我参加，还发给我一个红袖章，说去北京串联如果没有红袖章是不能上火车的，这样我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了。

1966年10月14号，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万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全部是大串联的学生，开往北京的火车根本上不去。我被高年级的学生举着从火车车窗里硬是塞进了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直愣愣地站了20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也不睡觉，心里却是豪情万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北京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心脏”！

日记又一则：

▲ 1966年10月14日 晴 北京

今天，是多么幸福啊！在今天，我来到了世界革命的心脏，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着的地方——北京，我们来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边。

下午4时30分钟，我们下了车，刚下车，我的心就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激动得像要跳出胸膛，不住地问着自己：我到了北京吗？广播员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同学们，你们已经来到了全世界全国人民向往着的地方——北京！同学们欢呼着跳跃着，高唱着革命歌曲，我们有多么幸福啊，我们来到了我们日夜想念的地方——北京！

在那之后的10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我也混杂在革命队伍中欢呼跳跃，欣喜若狂，如同亲眼见到神明一般的感觉。接见那天我因为发高烧生病被解放军战士架着来到长安街被接见的红卫兵队列中，还因为生病被安排坐到第一排，（紧靠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这样我的优势就是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同学中有很多人在队伍后面几排，当毛泽东的车队经过时，群情激昂，前面几排的学生都站起来欢呼跳跃，可怜后排的同学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前面同学的人头攒动。毛泽东的车队过去之后，那些什么也没看到的同学失声痛哭起来。

而我则在日记中写道：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下午1点18分，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毛主席他老人家精神饱满地站在吉普车上，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站在他的身旁。毛主席他老人家穿着绿色的军装，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身材魁梧，身体非常健康！

因为学生大串联引发的全国交通秩序大乱，沿途免费提供学生吃喝拉撒睡的接待站苦不堪言，最终中央下令停止乘车串联，为了继续保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斗志而改为步行串联，并美其名曰为“长征”。

1966年12月底，我们班上的8个女生组织了一个“小红军长征队”，决定要从武汉走到韶山参观伟大领袖的故居。我成份虽不好但也被班上的几个工农子弟接纳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不好根本不入我的法眼的女生好像是给了我一些恩赐，我虽然仍自视清高但更想参加革命。

就这样，8个刚满14岁的女孩子背着行囊扛着红旗，在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沿着武昌到长沙的铁路线，磕磕绊绊地走了12天终于到了长沙，后来又步行到韶山参观了领袖故居。我的日记中依然是豪言壮语，但在这豪言壮语的掩盖下，我对于自己能否真的参加革命，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没有丝毫底气。

革命的豪情过后，我内心非常失落彷徨，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时写的日记也充满了悲观情绪。学校仍然停课，偶尔提出“复课闹革命”，但是老师们都成了“反革命”没人教课，复课自然就成了了一句空话。学校后来进入了两派格斗的白热化阶段，大家专心搞武斗，更无人上课了。

我有一次去学校点卯，碰到一群高年级同学抓了一个女生，一个红卫兵看到了我，不知为何把我叫进了教室。我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女生解下军装上的粗皮带，抡圆了膀子使劲抽另一个女生，我看得目瞪口呆惊心动魄。

还有一次，我刚刚走进校门，就被一个“新6中”的红卫兵小将不由分说逮住要我去参加武汉“新派”大游行。我跟着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到了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高音喇叭里有人激昂地高喊：新六中的革命小将过来啦！随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旋律，我们则随着旋律载歌载舞。

在那次的大游行之后，震惊全国的武汉“7·20”惨案发生，武汉大乱，两派进入了真正的武装斗争，都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家附近的大智路电信局大楼被一派学生占领，对面的老通城则被另一派占领，双方手中都有枪支弹药，每天街头枪声四起。靠近我们家的武汉市第20中有一个学生在家门口被流弹打死，大街上一派萧杀气氛，晚上6点钟之后无人敢出门，我们再也不用去学校了。

逍遥的日子里我每天去菜场排队买菜，去煤店排队买蜂窝煤，去粮店排队买米。那年头样样东西都要排队，有时候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我和邻居小姐妹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绝活：菜场里无论什么时候到菜我们都能第一个得到消息，然后连哄带抢地买回家；我们经常要清早3点多钟起床去菜场排队买肉，买到了就得意洋洋。我每天用凭票买到的极其有限的柴米油盐酱醋糖，绞尽脑汁想着花样给全家人做饭。后来我倒也习惯了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一个学生变成了能干泼辣的家庭主妇，学校和上学堂念书对于我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两年折腾下来我们国家的主席被打倒了，下面各级大大小小的领导也都成了走资派，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一切。那些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初中高中生，还有1967和1968年也应该相继毕业的初中高中生一共被积压了6届（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终于等来了伟大领袖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12月份起，成百上千万知识青年全部被分配到农村边疆，那些“红五类”“黑七类”都成为了同一类而且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美称，我成为了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终于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2016年5月初稿  
2019年3月26日定稿  
美国北卡

〔本文作者：郭爱平，祖籍四川成都，生于武汉，1969年元月下放湖北天门，之后当过工人，图书馆员，科技情报资料馆员。现居美国北卡州。〕

□ 来源：特色文萃2

~~~~~  
【史海钩沉】

自贡文革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 王 锐 •

笔者收藏与研究文革小报多年，对本地的文革小报，应是有些发言权。在《自贡文革大事记》（未定稿）中，曾附有一个《自贡文革小报目录》，其中记录了笔者收藏与见过的自贡文革小报30余种（多数为油印，铅印小报仅数种）。

这里仅谈及文革时期，自贡出版的红卫兵小报（不包括荣县、富顺两县）。且只论及正规“铅印小报”，不涉及“油印小报”。

◇ 《红色恐怖报》横空出世

自贡红卫兵小报的油印版，大约兴起于1966年9、10月份。其时，市内各主要中学的学生造反派团队纷纷成立（那时自贡无高校，中学生成了本市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及引领者），对此前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形成强烈冲击。

学生造反派崛起后，要占领舆论，向社会及民众表达自己的文革诉求，当时除贴写大字报、大标语外，就是创办自己的报纸。红卫兵小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起的。

自贡最早的红卫兵报，都是油印小报。这是因为，其时自贡能印铅印报纸的，仅《自贡报》印刷厂一家。而该厂自建厂以来，被官方牢牢控制着，学生造反派无法染指。

最早的油印小报，形形色色，大多印得粗糙简陋，不忍目视。宣传舆论效果，自是差了很多。因此，创办一份自家控制的铅印小报，成了自贡红卫兵造反派的梦想。

这个梦想，一直到1966年接近年底，才终于得以实现。

1966年12月14日，一份名为《红色恐怖报》（特刊）的铅印小报，在自贡横空出世。

“红色恐怖”这几个字，如今读来，肯定会让人联想到恐怖分子，或恐怖行为、恐怖事件等等，不免感到触目惊心，背生寒意。况且，仅那报名，即可能触及国家《反恐法》。可在当时，却是让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们，视为“革命时髦”，对之大肆宣扬。

“红色恐怖”一词的发明权，据笔者所知，倒不在用此作报名的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这里，而在天子脚下，京城里面的北京六中。

1966年9、10月间，北京六中以“红二代”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在校内私设“临时监狱”，关押拷打所谓的“黑帮”，及他们看不顺眼的任何人。将人活活打死后，竟然用死者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大字，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当年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的所谓“红二代”，其“文革暴行”，可说旷世少有，罄竹难书。

平心而论，自贡的红卫兵，哪怕造反派红卫兵，虽然批斗及其他场合，偶尔也有动手打人的事发生，但大多数时候，是动口不动手。不过，其对“红色恐怖”的向往，心理上却是一致的。不然，不会将其作为小报的报名。

这份《红色恐怖报》，最早仍是油印小报，传播范围及影响有限。笔者文革一直在自贡，就从未见过哪怕一份油印《红色恐怖报》。

可以说，《红色恐怖报》能出铅印特刊，应当感谢《自贡报》。当然，这个感谢应当打上引号。归根结底，是《自贡报》成了它的“靶子”，成了它批判攻击的头号目标，这份《红色恐怖报》特刊才得以问世。

从内容看，这期《红色恐怖报》（特刊），应算以前那份油印《红色恐怖报》的合刊，所载文章，大都在此前的数期油印小报上登载过。只不过，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称：在这次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自贡报》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认清《自贡报》和自贡市委的反动面目，给予彻底揭发和批判，我们特将《自贡报》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分辑摘编，供大家参考。

《自贡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极端严重的。这是自贡市委内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野心的大暴露。我们揭发批判《自贡报》和自贡市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编者的话”最后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还号召：“我们热切地希望全体革命同志和我们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自贡报》、自贡市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有意思的是，这期猛烈攻击《自贡报》的《红色恐怖报》（特刊），竟然被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强令必须随当天的《自贡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及读者手中。

如此看，当天的《自贡报》印了多少份，这《红色恐怖报》（特刊）也一样被强令印了多少份，肯定只多不少。而且，报纸发送，事关邮电部门，不是《自贡报》能决定的事，必经市委批准同意才行。

自贡造反派红卫兵此举，仿效的是前不久上海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做法。强令他们批判攻击《解放日报》的那份《红卫战报》第9期，必须随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及读者手中。《解放日报》不肯答应，造反派红卫兵就强行进驻报社，造成《解放日报》停刊的严重事件。最后，在王洪文带领的上海工总司强力支持下，上海红卫兵大获全胜，上海市委被迫同意了对方要求。那份《红卫战报》第9期，在报社印刷厂强印20多万份，随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此次《自贡报》的较量，报社一边自然也败走麦城。这是因为，此时不仅《自贡报》报社，连自贡市委也陷入风雨飘摇中，自身难保。这份《红色恐怖报》（特刊），也就随当天的《自贡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手中。

此后，铅印版的《红色恐怖报》，还陆续出刊了多期。

◇ 《自贡报》为何成了首要攻击目标

红卫兵造反派在自贡崛起以来，其最终目标，是要打倒整垮自贡市委。而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整垮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是先拿《北京晚报》及《北京日报》开刀。由此，各省市造反派、红卫兵要打倒当地的省、市委时，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当地的党报党刊。

自贡的造反派红卫兵要整倒自贡市委，也如法炮制，首先将矛头指向了自贡市委机关报《自贡报》。

1966年10月20日，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主办的《红色恐怖报》油印版，发表“编辑部文章”：《从自贡报的反动立场看自贡市委的丑恶嘴脸》。文章称：“从《自贡报》这些严重问题来看，我们可以大胆怀疑：市委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它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还值得打上一个大问号！”

文章还警告说：“我们要向市委，特别是它的代表——自贡市委宣传部主管的《自贡报》大喝一声：你们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绝路！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决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11月2日，《红色恐怖报》再次发表“编辑部文章”：《造自贡报编辑部的反》。这次的“编辑部文章”，攻击《自贡报》编辑部及自贡市委的调门，又提高了不少。

文章宣称：“这条毒蛇就是《自贡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已经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の营垒。他们利用《自贡报》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射出了无数毒箭。”

“编辑部文章”还进一步宣称：“这条毒蛇老巢就是自贡市委。这个市委已经成了《自贡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策源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色司令部。这个市委中的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利用自己的职权，已经干尽了反党反人民的坏事。他们把《自贡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前沿阵地。”

把《自贡报》比作“毒蛇”，把自贡市委视为“毒蛇老巢”，如此激烈的攻击性语言，如此高的上纲上线批判调门，表明以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完全把《自贡报》及自贡市委，视为反动势力及打倒目标，必欲整垮而后快。

1966年11月，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组建了一个小分队，强行进驻《自贡报》社。学生“小分队”与报社内部造反派联合一起，协同作战，全力以赴揭批查找问题，搜集《自贡报》的相关材料，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进攻姿态。

由此，《自贡报》的处境日益艰难，离被查封关门，已为期不远了。

1967年1月2日下午，在闹市区十字口（文革中更名为“英雄口”）广场，由79个革命造反派团队联合召开了“声讨《自贡报》罪行大会”。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封闭《自贡报》地方版，报上只刊载新华社电讯及中央报纸文章。

半个月之后的1月16日，《自贡报》终于被造反派全面夺权接管。

◇ 《公社之声》生不逢时

自贡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主流派别后，在自贡军方（市武装部）协调引导下，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全市性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这是1967年1月份的事。

“毛泽东主义公社”成立后，开始筹划创办一份正式的铅印红卫兵小报。

1967年3月初，一份名为《公社之声》的铅印小报，在自贡创刊问世。《公社之声》是如《自贡报》一样的4开4版小报，系“毛泽东主义公社”的机关报。

不过，从大的文革形势来看，这份《公社之声》，创刊问世不是时候。这是因为，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四川文革局势发生了大逆转。以中央军委“2·17信件”为发端，掌控全川局势的成都军区为首的四川军方，开始了“二月镇反”。各地大批造反团队被打为“反革命组织”，主要的造反派头头及成员，被捕入狱。

市武装部为首的自贡军方，一直支持造反派之故，自贡地区的“镇反”开始稍迟。3月初，成都军区派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军区独立团进驻自贡，接管了全市“支左”大权，市武装部领导班子遭到清洗。《公社之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刊的，所以说它“生不逢时”。

有鉴于文革局势的逆转，一向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也不得不在3月6日出刊的《公社之声》第2期上，一改以往火药味十足的激进好斗风格，从内容到版面都显得低调、平和，极像一份官报，而不是造反意味浓厚的红卫兵小报。

尽管如此，《公社之声》仍然没逃脱被停刊的命运。在勉强出了第2期后，这份全市唯一的红卫兵小报，还是被停刊了，编辑部办公室亦被查封。这份《公社之声》第2期，没宣告停刊启事的“停刊号”。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文革局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大逆转。在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直接干预下，成都军区主导的“二月镇反”，被中央彻底否定。全川而言，被捕入狱的造反派全部释放，并重新崛起，成了掌控局势主流派。

《公社之声》得以于4月中旬复刊。复刊的初始阶段，是每期4开2版格式。试刊几期之后，恢复成4开4版的格局。

复刊后的《公社之声》，立即恢复了火药味十足的战斗风格，其攻击矛头，首先自然是指向在自贡主持“镇反”的刘尚武为首军方，及执行“镇反”捕人的，原“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

由此，4月15日，《公社之声》复刊后的第2期（即第4号），即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了那篇震动全市的《敦促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投降书》。这个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是刘尚武带独立团进驻自贡后，为开展“镇反”仓促建立起来的，无合法程序。

这篇《敦促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投降书》，由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首都红代会“反逆流”兵团联合署名。文章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现在是彻底清算你们的罪行的时候了！”

4月19日，《公社之声》第6号，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了，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首都红代会“反逆流”兵团联合署名的《关于打倒刘尚武的联合声明》。

《公社之声》刊载这些文章，在社会各界造成的震动和影响，是相当大的。要知道，4月中旬那个时候，局势仍很紧张，且有些变幻莫测。刘尚武为首独立团还掌握着枪杆子，驻军安在十字口广场左侧，市二轻局四楼平台上的武装士兵岗哨，仍昼夜监视着整个城市的动静。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及骨干，还被关在监狱里未释放。关押在“五云村看守所”的几百造反派，虽在4月7日至4月9日，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集体绝食”，但外界对此几一无所知。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还控制着全市警力和监狱，拥有捕人关人权。

所以说，《公社之声》这些举措，是相当大胆，需要些胆识和勇气的。也由此，《公社之声》当时收获了相当多的人心。其时，每期刚出印厂，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公社之声》一到闹市街头，市民即争着抢购，互相传阅。

直到“市无司”（即后来的“市工代会”）等主办《盐都炮声》创刊为止，这份《公社之声》小报，是当年自贡地区唯一由造反派主办的铅印小报，在坊间有较大的影响和较佳的口碑。

《公社之声》一直出刊到1967年7月初，被《自贡红卫兵》报取代为止。笔者收藏的最后一期《公社之声》，是该报出的“七一专刊”，出报时间是1967年7月1日。其报头上无期号，但在第四版最下面，用小字注有，“第24期”字样。

由此，这份《公社之声》，从1967年3月初创刊，到1967年7月初终刊，一共出报24期。

◇ 《自贡红卫兵》创刊

1967年7月8至12日，“自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在市工人文化宫隆重召开。

实现大联合，建立各级“红代会”，这是毛泽东及中央，打算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正轨，并最终取代“共青团”的一个重大举措。

7月10日，《自贡红卫兵》报创刊。这份《自贡红卫兵》，作为“市红代会”的机关报，并取代了原先的《公社之声》。

这期《自贡红卫兵》创刊号，破例印成对开大报（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一样规格），而且是套红印刷。创刊号第一版，全文刊载“自贡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另外还刊载了《告全省红卫兵书》，以及《自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

有意思的是，这期《自贡红卫兵》创刊号上，还刊发了一幅照片，所展示的是“自贡红代会”的三个红卫兵袖章。照片说明文字写道：这三个“自贡红代会”的红卫兵袖章，分别赠给伟大领袖毛泽东，副统帅林彪，及江青同志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

现在看来，“自贡红代会”的头头，此举显然有点自作多情了。当年各省、市、自治区各级“红代会”简直多如牛毛。每家“红代会”都把自家红卫兵袖章，送给毛、林、江，中南海及钓鱼台，不知要好大一个仓库才能装得下！估计，这类赠品，还没到中南海或者钓鱼台那种核心地方，就被扫弃在哪个垃圾堆里了。

这份《自贡红卫兵》报，创刊以来直到终刊，其风格稍显平稳，既没有原《公社之声》那样锋芒毕露，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姿态；也不如后来创刊，由“市工代会”等主办《盐都炮声》那样富有攻击性。总之，所出刊的30多期《自贡红卫兵》，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举动。

其总体精神和办报方针，是紧跟中央“两报一刊”（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面批刘少奇，也紧跟批刘；上面批彭德怀、罗瑞卿，它亦紧跟批彭德怀、罗瑞卿。

值得一提的是，《自贡红卫兵》报红27期（总51期），在一版头条位置，醒目刊载了一份内部电文：《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委员会决定》。全文如下：

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自贡市武装部，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军区党委常委第三百三十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自贡市革筹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自贡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李宗白、冯金璋、张崇亮、赵斌、李秉玉、林振礼、储成明、周光文、陈永发、吴纪昌、谢文清、陈显生、潘明举、孙科明、彭朝游十五人组成。由李宗白同志任主任，冯金璋、张崇亮二同志任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个名单，就是文革中新建立的所谓“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用以取代原自贡市委、自贡市人委（市政府），其第一届班子成员名单。

其中，李宗白、张崇亮、赵斌、李秉玉来自军队，李、张、赵，是市武装部领导，李秉玉是驻自贡的陆军第54医院的政委；冯金璋、林振礼、储成明三人，是革命干部代表，来自自贡市委、市监委（即现今市纪委）；周光文、陈永发、吴纪昌三人，是工人代表，来自“市工代会”；谢文清、陈显生二人，是贫下中农代表，来自“市农代会”；潘明举、孙科明二人，是学生代表，来自“市红代会”；彭朝游是公检法机关代表，来自市公安局“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

也由此，这份《自贡红卫兵》报红 2 7 期，具有难得的文献价值。

据笔者收集所藏，《自贡红卫兵》报出刊到第 5 7 期（应是总 5 7 期），出刊时间是 1 9 6 8 年 8 月。除去前面 2 4 期《公社之声》，《自贡红卫兵》报实际出刊 3 3 期。

这期《自贡红卫兵》报，又破例出刊对开大报。主要内容，是为配合当时的“清队”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职工队伍、造反派内部，寻找并揪出“阶级敌人”。《自贡红卫兵》报又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已被造反派掌权的《自贡报》社内部。报社内被点名攻击者，有于光、何青等。这些人，大都是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老造反”。

《自贡红卫兵》此举，当然在全市造反派内部，引起了相当争议。不过，从全国来讲，红卫兵运动已逐渐从低潮走向衰落。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自贡红代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已经进入“市革委会”任职的孙科明、潘明举等头头，迎接他们的，都是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运。

《自贡红卫兵》亦因之停刊。自《自贡红卫兵》第 5 7 期后，就再没有出刊。

红卫兵小报的没落，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走向衰亡。曾经声称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毛泽东而战”，在文革舞台上冲锋陷阵，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就此被毛泽东本人，毫不留情地从政治舞台上“扫地出门”。

2 0 1 9 年 9 月下旬于自贡危楼斋

□ 《南湖雅集》微信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